



项楚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敦煌语言文学论集



NLIC 297073427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楚敦煌语言文学论集/项楚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3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5751-6

I. ①项... II. ①项... III. ①敦煌学—语言学—文集
②敦煌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1-53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758 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项楚敦煌语言文学论集

项 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8.125 插页 2 字数 422,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751—6

I · 2267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委会

主 编：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 委：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

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郑阿财（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涌泉（浙江大学教授）

邓文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高田时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 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 30 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14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余册,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 2010 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 4 人,毕业博士 54 人,14 人晋升教授,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导师,20 人晋升副教授,33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余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代前言）

1962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专攻六朝唐宋文学。当时我潜心研究的对象，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化高涨时期涌现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深深迷恋着这些伟大诗人的不朽作品，并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研究计划，我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接着又当了十年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时机使我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1976年，我从中学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不久就接到一项任务：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这样，我初次接触到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在惊异之中，从内心赞叹唐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采。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在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等，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然而，这些在当时由人民群众所创作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却远远没有为今天的人民群众所欣赏和接受，就是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时时表现出对它们的隔膜和误解。

这是有原因的。今天阅读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和其他敦煌俗文学作品，存在着三个主要障碍：一是由于抄写卷子的人文化水平低，原卷

文字错讹脱漏严重,其间还有许多当时民间流行的俗字,也增加了辨识的困难;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这在当时虽是一听就懂,今天的读者却感到难以索解;三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们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和我们今天有较大差距,例如其中有大量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今天的一般读者就很难读懂了。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和外国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例如王重民先生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过初步校勘、比较完备可读的变文总集,蒋礼鸿先生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解释变文中俗语词的开山之作。我在接触敦煌文学之初,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这两部著作,是它们把我领进了敦煌学的殿堂。不过敦煌文学(这里主要指敦煌俗文学)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难题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继续攻克这三个障碍作为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就需要重新学习。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柢。这一次则是埋头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例如《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全唐诗》等总集读了不止一遍,《太平御览》本是供查阅的,我也逐条读完,这就等于分门别类地读了许多古佚书的残文。在这个基础上,再旁及别的杂著乃至某些较偏僻的著作。

曾经有研究生问我:你啃大部头的书,例如花上两三年时间通读《大藏经》,难道不觉得枯燥吗?读完以后,究竟又有多大的收获呢?

这一切都取决于怎样去读它。我在通读《大藏经》以前,也曾犹豫过好一阵子。可是要真正弄通敦煌文学中有关佛教的许多问题,这是最彻底的办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一咬牙,就读下去了。每当遇到与此有关的材料,便欣喜异常,兴趣大增,否则也会感到枯燥。不过很快我便发现,佛藏实在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大宝藏,从中可以得到多

方面的收获,原来的阅读目的太狭窄了。举例说吧,历代翻译佛经的人,多数都不是汉族人,他们是从实际生活中学习汉语的,不可能像汉族士大夫那样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自然不可能像汉族士大夫那样“掉书袋”,这就造成了汉译佛经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保存了自东汉以来大量的珍贵的口语资料。因此,从佛经中搜集实例来和敦煌俗文学中的唐五代口语词汇相印证,也成为我的一件乐事。又比如,在这以前我已精读了《太平广记》和大量笔记小说,记得鲁迅先生曾举出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羨书生”的情节来源于佛经的著名例子,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小说和佛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我积累的材料看,竟有若干小说的情节是改编佛经故事,或受了佛经故事的影响而形成的。《红楼梦》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的情节和《三笑》中秋香戏弄华氏兄弟的情节有相通之处,应该都是受了唐皇甫枚《三水小牍》中“却要”故事的影响,而“却要”故事却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二所载长者妻戏弄五少年的故事移植而来,只是皇甫枚把这个故事完全中国化了,所以使人不容易发觉它另有来源罢了。从深一层看,佛教的某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历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直延续到近代。我在童年时代,常常听到街坊大人责骂孩子,总是称为“冤家”、“短命鬼”、“讨债鬼”等,后来又读了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及至研究王梵志诗中“怨家杀人贼,即是短命子。……债主暂过来,征我夫妻泪”(《王梵志诗校辑》七六首),这才认真探究这种观念的来源,原来答案就在佛经之中。《五苦章句经》把“父子夫妇”等等各种关系归结为“怨家”、“债主”等五种因缘,《众经撰杂譬喻》中就记载了短命子向生母讨还前世冤债的故事,影响所及,我国小说中这类故事举不胜举。《太平广记》卷一二五《卢叔伦女》所写的短命子,不但讨还前世钱财,兼及父母的眼泪,这就是王梵志诗中的“征我夫妻泪”。由此回想到《红楼梦》第一回中绛珠仙草“还泪”之说,就觉得不是无源

之水了。在我读完《大藏经》，进行自我小结时，我认为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虚掷，因为我不但积累了敦煌文学研究的许多宝贵资料，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对于中国文化史有了更为真切和深入的认识，仿佛潜水员开始看到大海深处另一个奇异的世界一般。在我读完其他大部头著作时，也常有类似的感受。一个治学者在学术的海洋中，领悟到融会贯通、豁然开朗的境界，天下乐事莫过于此了。

因此我对这位研究生说，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学术，趁着年纪还轻，下决心坐几年冷板凳，啃几部大部头的基本书，这会使你终生受益的。不要急功近利，但不是不要功利。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因此一定要带着满脑袋的问题去读书，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搜集解决新的问题的资料，使知识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如此往复不已，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领域和治学门径。

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代学术研究已经显示出综合的趋势。研究敦煌文学，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那么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工夫，就是必要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门门精通，可是学识的深广程度决定着学术成就的大小，却是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这个目标。

读懂敦煌文学作品是研究敦煌文学的前提，由于敦煌写本的特点，文字校勘和语词诠释就是深入研究的第一步。陈垣先生指出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于理校法则曰：“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这些都是校勘敦煌写本的基本方法，而在许多场合，往往只有正确运用理校法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不啻是对研究者学识的严格考验。手眼的高低取决于基本功的深浅和知识面的宽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一般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未必够用。例如字形相近是写错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写本误字往往与今

体文字略不相似,因为它是和当时民间的俗字形体相近。又如字音相近是写别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写本误字读起来和正字差别甚远,因为它是和唐五代西北方音相近而写错了的。又比如有的词语非常眼生,辞书从无记载,然而并没有写错,因为它是传统训诂学所忽略的口语词汇。何况校勘并不单纯是文字问题,首先是对文意的理解问题,这其中的问题五花八门,不打一处来,研究者只有相应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才有可能应付裕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有这么几句:“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其中“游泥”一词,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来应该是“淤泥”,“淤(污)”字由于形近错成了“游”,“污泥伽蓝”是说把寺院弄脏。说穿了极其简单,得来却十分不易。因为我曾在佛经中几次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的话,这才有可能茅塞顿开,否则以我之钝根不慧,也许至今还在绞脑汁呢。王梵志诗中有这么几句:“积聚万金花,望得千年有。不知冥道中,车子来相受。”有的文章认为“车子”错了,应该改作“妻子”等等,却不知道“车子”原是人名。干宝《搜神记》卷一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周擎曄的人,命定贫穷。有一天梦见天公可怜他,把命中注定属于尚未出生的张车子的钱千万,暂时借给他,从此果然逐渐成了富人。周家有个贫穷女雇工张姬,在车房生了个私生子,取名车子。后来周家就逐渐穷了,而车子长大后却成了富人,命中属于张车子的财富终于还给了他。《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立赋》云:“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旧注也详引张车子故事来解释这两句,李善注说见《鬼神志》及《搜神记》。《抱朴子内篇·辨问》也说:“为人生本有定命,张车子之说是也。”可见张车子故事自东汉以来,流传十分广泛,梵志诗正是用了这个典故,说明贫富循环,皆由天定。研究者浏览偶有未备,就会造成了错改原文的结果。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敦煌文学所

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虽然以研究敦煌文学为方向,可是眼界始终要放得更开阔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某些细节,实际上就是要透彻地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那个历史环境。王梵志诗中还有这么几句:“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不虑弃家门,苟偷且求养。”这诗是写佐史的,“苟偷且求养”究竟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中国封建社会提倡孝道和尊老,唐代也有“侍丁”制度。《唐六典》记载,凡民年满八十、九十乃至百岁,分别给侍丁一人、二人乃至五人,以尽终养。侍丁免除各种徭役,多取近亲,但也可外取白丁充当。唐代品官的直系亲属有免役的特权,可是佐史是胥吏,“未是好出身”,没有这种特权,他们的成丁子弟是要服兵役的。然而佐史自有“避征防”的高招,那就是让他们的子弟充当侍养老亲的“侍丁”,这就是“苟偷且求养”,其中自然免不了移花接木等等手段,所以作者用了“苟偷”二字。当了侍丁就不愁离乡背井,所以说“不虑弃家门”。这样看来,这几句诗写了佐史为子弟逃避兵役而走后台的普遍现象,可以补史书的漏载,加深对那个社会的认识。不过王梵志诗的原文并没有出现“侍丁”这类字样,如果我们不是很熟悉唐代的制度,便很难读懂这几句诗了。梵志诗中还有这么几句:“本巡连索人,樽主告平人。当不怪来晚,覆盏可连精。”这几句诗中需要解释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解释“索人”和“平人”。这两处的“人”字其实都是重复记号,应该读作“索索”和“平平”,但这仍然很难懂。在《唐国史补》、《刘宾客嘉话录》、宋窦苹《酒谱》和《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引《赞宁要言》中,都曾提到唐高宗时壁州刺史邓宏庆创制“平索看精”四字酒令的事,而“索索”和“平平”就在这四字之中。四字酒令的具体内容在宋代已经失传,所以今天难言其详,但是沿着它的提示继续考索,就可以明白这首费解的诗,其实是写饮酒行令之趣。你看,能否读懂一首诗,关键就在于是否知道久已失传的四字酒令这么一件小事。而要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学,就要从弄

清许许多多这类“小事”开始,进而在不同的层次上不断地分析和综合,上下联系,左右贯通,实现认识的飞跃,才能得出各种准确和全面的结论。

敦煌文学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创作,经过一千年的历史尘埋,今天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光彩。目前我正在写作《敦煌变文选注》,集中了变文中的精华作品详加诠释,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使这份珍贵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

(原载《文史知识》1987 年第 12 期)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代前言)·····		1
敦煌文学杂考·····		1
《维摩碎金》探索·····		22
敦煌本《燕子赋》札记·····		36
令章大师李稍云·····		52
从印度走进中国		
——敦煌变文中的帝释·····		56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		70
变文字义零拾·····		90
敦煌变文语词札记·····		110
敦煌变文语词校释·····		136
敦煌变文语词校释商兑·····		145
《伍子胥变文》补校·····		155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补校·····		177
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补校·····		199
敦煌本《孝子传》补校·····		222

《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	235
敦煌变文新校·····	266
《庐山远公话》新校·····	282
王梵志诗论·····	303
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	340
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	357
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	364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	378
王梵志诗释词·····	419
《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	434
S5588 号写本之再探索	
——《敦煌歌辞总编》[求因果]匡补·····	461
敦煌本《行路难》之再探讨·····	483
《老子化胡经·玄歌》考校·····	506
《补全唐诗》二种续校·····	525
作者论著目录·····	558

敦煌文学杂考

释亡名与敦煌文学

敦煌写卷伯三八一四号，写有白话五言诗若干首，未署作者姓名，目前学术界公认是王梵志诗。其中有如下一首（亦见伯三七二四号）：

前死未长别，后来亦非久。
新坟影旧塚，相续似鱼鳞（鳞）。
义陵（陵）秋（秋）节远，曾逢几个春。
万劫同今日，一种化微尘。
定知见土里，还待（得）旧时人。
频□（开）积代骨，为坑埋我身。

乍睹此诗，似曾相识。原来在《广弘明集》卷三〇下，收录周释亡名创作的宗教诗若干首，其中有一首《五盛阴》：

先去非长别，后来非久亲。
新坟将旧家（冢），相次似鱼鳞。
茂陵谁辨汉，骊山讵识秦。